Globethics Repository



在史學與神學之間的《聖經》解釋學——與漢森談當代《聖經》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OU, Bi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8 15:27:1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02

在史學與神學之間的《聖經》解釋學

——與漢森談當代《聖經》研究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副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

以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提出的五經底本假說為標誌，西方經學進入新經學時期，歷史評斷學（historical criticism）一度成為《聖經》研究的學術主流。但是，大約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聖經》研究進入多元分化時期，各種《聖經》解釋學立場、方案紛紛提出，而傳統的神學釋經學（theological hermeneutics）也在吸收歷史評斷學的成果上，以「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正典評斷學」（canonical criticism）的形式，躋身於其中。因此，當代神學釋經學的基本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是甚麼？秉持甚麼樣的基本理路？如何看待它與歷史評斷諸方法的關係？如何理解《聖經》詮釋的多元宗教、多元群體的立場？如何理解歷史評斷學之為學術公器，與解釋群體的分化立場之間的關係？

以這些問題，我們問學於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漢森（Paul Hanson）。[1]漢森教授曾受教於海德堡，就學於

1. 漢森是哈佛大學萊蒙神學教授（Lamont Professor of Divinity），著有《神召之民：〈聖經〉敘事中信仰群體的成長》（*The People Called: The Growth of Community in the Bibl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以賽亞書〉四十至六

《舊約》神學泰斗拉德（Gerhard von Rad），後又到耶魯學習，列於蔡爾茲（Brevard Childs）門下，其後又到哈佛近東系學習並工作，與克洛斯（Frank M. Cross）、賴特（George E. Wright）等著名《舊約》學者共事。其學術譜系既出自《舊約》神學、正典評斷學，又深諳歷史評斷學。他對上述基本問題的回答，也許能有助於漢語學界對於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處境中進行《聖經》解釋學的探索。

在漢森看來，神學釋經學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在歷史評斷學之後，如何理解《聖經》的權威（authority）？啟蒙運動之後，人們以研究其他文化經典的同樣方式來研究《聖經》。這樣，《聖經》研究的基本問題就發生了完全轉變。人們不再問我們在《聖經》中可以與甚麼樣的「上帝話語」相遇，而是問這一文本的作者是誰，它的「最初形式的」（original form）文本是甚麼樣的。例如，正典《以賽亞書》就被普遍認為有三個「以賽亞」作者。因此，在經過啟蒙運動與歷史評斷學的洗禮後，神學釋經學要談論的「聖經權威」，必須要問：上帝如何像對待《聖經》時代的人們一樣信實地對待今天的人們，他的話語如何規範着當下的信仰群體。因此，神學釋經學乃需要分成二個步驟：一是研究對《聖經》時代的上帝之民而言，那些文本如何成為「上帝的話」；二是討論對於處於當下情境之中的當代人們而言，這些文本如何仍然是信仰

十章》（*Isaiah 40-66*;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1995）；《〈舊約〉的啟示性》（*Old Testament Apocalyptic*;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87）；《文本的多元性：一個神學的詮釋》（*The diversity of Scripture: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啟示性的開端》（*The Dawn of Apocalyptic*;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5）；《動態超越：〈聖經〉信仰宣告與當代經驗之關聯》（*Dynamic Transcendence: The Correlation of Confessional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A Biblical Model of Divine Activ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8），倡導以《聖經》神學方法展開對《希伯來聖經》的研究與詮釋，提出以「動態超越」來理解希伯來宗教的傳統史，對於天啟文學亦有獨到研究。

群體的「上帝話語」。正典評斷學的一個代表人物桑德斯（James A. Sanders），就將前者稱為「正典過程」（canonical process），後者被稱為「正典釋經學」（canonical hermeneutics）。後者主要討論的就是，《聖經》如何作為「上帝的活的話語」，其意義仍然可以穿透時空進入當代的信仰群體。漢森自己也比較贊同這樣的研究取向。

談到正典評斷學與歷史評斷學的關係時，漢森以自己所熟悉的二位老師蔡爾茲、克洛斯為例，認為歷史評斷學對於《聖經》的歷史文學研究非常重要，通過古文字學、考古學、與大西亞文化的比較研究，恰恰可以揭示人們所未曾想到的《聖經》文本意義，比如對《出埃及記》十五章的紅海之歌的研究，就帶出了豐富的迦南文化背景。但是，對於純粹的歷史文學研究來說，它關心的問題只是：是甚麼樣的迦南文化、以色列人的甚麼生活處境，產生了這樣的文本？而對於神學釋經學來說，人們還要問：這段話的神學含義是甚麼？它對於今天的信仰群體有何意義？就《出埃及記》十五章來說，它在進入正典文本之後，又獲得了新的意義，所以蔡爾茲就通過對它在整個《五經》正典敘事中的位置的分析，指出它對於溝通《舊約》神學的拯救與創造兩大神學主題的作用。但漢森同時指出，蔡爾茲的正典評斷學有它的缺陷所在，即只強調《聖經》文本在最後形式的（final form）正典中的意義。他更贊同拉德的看法，認為不僅要注重正典的最後形式，而且特別要注意《聖經》歷史上的每一個「正典時刻」（canonical moment），在動態的歷史進程中分析正典與信仰群體之間的關係。因為只有這樣，上帝的話語才是在歷史之中的活的話語。借用拉德的話來說：「上帝的話不應當被供奉

在一本書中，而應當活在人們的歷史之中。」

由於《聖經》的文本材料是相對固定的，因此《聖經》學界普遍認為，《聖經》研究的新突破需要考古學、古文字學的帶動，認為《聖經》研究將來最有學術成就的乃是《聖經》考古學（archaeology）和古文字學（philology）。漢森認為，這一看法主要出自一些老牌研究性大學如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等，但在更加廣泛的《聖經》學界，《聖經》不是作為一個文本，而是作為信仰群體的權威正典來研究的，因此神學解釋學仍然是主流的、正當的、有效的方法。通過考古學、古文字學確實可以給人們對《聖經》文本的理解增添新的亮光，但是《聖經》文本的產生、流傳、正典化都被理解為有權威的「上帝話語」，此後又一直處在活生生的各大宗教傳統之中，將它局限地理解為一個「意義中立」的文獻，恰恰是對《聖經》的真實意義的遮蔽。因為，對《聖經》這樣一個文本來說，它的神學意義就是它的事實意義。

北美的《聖經》學界，有着較明顯的實用傾向（pragmatic）。這裏的實用指的是它的社會學功用，《聖經》解釋學易於與某個群體的宗教傳統、族群身份、性別等結合在一起。《聖經》研究之為學術公器，就在於它向各種宗教、文化背景的分殊群體的開放性。漢森認為，與其說這是一個北美現象，不如說是一個後現代、解構主義的現象，也就是說，它把教會這樣一個整齊的解釋群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分解為眾多的、有各自興趣的次群體，例如女性主義釋經、環保主義釋經、黑人的解放神學等。但是，《聖經》解釋學的分化同時也呼喚一個更加廣泛的「神學話域」（theological discourse），因為這

些分殊的群體其實都要面對一些根本的神學問題。而且，「解釋群體的分解（fragmentation）」帶來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群體都設定一個自己的議程，而這些議程之間卻不可以共享，也無法共通。他們陷入到嚴重的解釋學困境之中，即他們提問的方式受制於他們的解釋學前提，得出的結論也早就隱含在他們的前提之中。對後現代的《聖經》學界來說，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使得這些分散的立場，通過「文明的」（civil）對話方式，向彼此開放，以達到某一個共同的基礎，來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

欲使《聖經》研究成為學術之公器，另一個隱含的問題在於如何看待《聖經》研究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正在寫作「《聖經》信仰與政治」的漢森對這一問題很感興趣。在他看來，走向公共領域的《聖經》研究要面對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闡述信仰群體的集體身份與它的《聖經》稟性（scriptural heritage）之間的根本關係？這也應當成為《聖經》神學的一個基本問題意識，因為在《聖經》歷史上，那些信仰群體的身份也深深地植根於他們的「經書」（Book），《聖經》宗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本體論」（historical ontology）。它堅持向新的生活經驗保持開放，但又不斷地回憶過去、重述歷史，以舊有的神學傳統來整合新經驗。因此，對於一個由高度分化的多元群體組成的社會來說，要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每一個群體都要清楚他們的群體身份來自於他們的「經書」傳統。然後，這些身份各不相同的群體在進入公共領域的對話時，又不囿於他們的「經書」傳統，而願意向某個共同的善（common good）開放。也就是說，他們既持守各自的傳統，又追求共同的善。在這一過程中，解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應該堅持，即沒有哪一個詮釋角度高於另一個，這是

所謂的「文明對話」（civil discourse）的本質。

在當前的宗教格局中，《聖經》同屬於三個宗教傳統，即猶太教、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它們各自的《聖經》學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那麼，基督新教的神學釋經能從另外兩個大傳統學到甚麼呢？在漢森看來，大體地說，猶太教的傳統相當重視《聖經》文本的「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而非常謹慎地對待所謂「深層意義」（deep meaning）。這樣的釋經傳統，在宗教改革時期，也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家們反對中世紀天主教以寓意解經法來使《聖經》為教會服務的革命運動。今天的新教釋經同樣需要學習猶太傳統的扎實的歷史文本功夫。將宗教改革後的新教與天主教的釋經學路線進行比較，天主教認為《聖經》的解釋權在教會，而相對而言，新教主張人人有權解釋《聖經》，可能也是引發教派間衝突的一個誘因。在漢森看來，更重要的是，在當前多元宗教的現實下，《聖經》解釋可能或多或少地扮演一個各大宗教的「相遇平台」（meeting ground）。在梵二會議後，天主教《聖經》學者深受新教《聖經》研究的影響，不再從一些教義出發釋經，而主張使《聖經》的神學意義自由地流露出來。同時，在漢森看來，沿着路德－加爾文宗改革路線下來的新教《聖經》研究，強調啟示高於自然，忽視了《聖經》中的「自然神學」因素，而天主教傳統一直對《聖經》的自然神學、自然法維度十分看重，智慧文學的研究亦有相當成就，這是新教釋經應該向天主教學習的地方。

最後，漢森雖然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西方學者，無法對漢語神學中《聖經》學的路向多下斷言，但出於對《聖經》學的豐富經驗和深刻了解，他對漢語語境的《聖經》學充滿期望。在他看來，《聖經》傳播的歷史展示了《聖

經》傳統兼具的「穩定性」（stability）和「可適性」（adaptability），聖言與文化之間的張力既是阻力，也是動力。通過對已經化身於漢語語境中近千年的基督教傳統的複述，也許就可以發現其中已經蘊含了一個中國基督教的經學譜系，即所謂「本土的《聖經》神學傳統」。此外，《聖經》的傳佈史也表明，《聖經》從來不將自己理解為真理的文本化身，是一個「神秘的給定之物」（a mythological given）。從正典《聖經》產生的過程，以及此後的《聖經》解釋學歷史都可看到，《聖經》中的信仰真理（confessional truth）總是不斷地向新的歷史經驗開放的。因此，一個接受漢語生存經驗衝撞，又將這一生存經驗容納於其中的《聖經》神學釋經學是可以期待的。

就筆者所知，當前北美的《聖經》學界，大致可以依其學術理路、理論旨趣與信仰關懷的不同而分成三個陣營，一個是專注於對《聖經》文本進行古語言學、考古學、歷史文化的比較研究，堅持認為「古語言學和考古學是《聖經》學最有成果的研究方法」；另一個則接續教會傳統，主張闡發《聖經》的神學意涵，認為當代的《聖經》學不能脫離基督教或猶太教幾千年的神學釋經學傳統，但又必須結合歷史評斷學的研究成果，漢森大致追隨這一取向；另一個則結合當代的人文社科思潮或者某個信仰群體的特殊處境，來分析或解釋《聖經》文本，所謂後現代的釋經研究、女性主義釋經、後殖民理論的釋經，大致即屬於這一陣營。

按筆者對於漢語學界的有限了解，漢森既吸收歷史評斷學的研究成果，又紮根於悠久的基督教神學傳統的《聖經》學研究路向值得借鑒。它將《聖經》理解為一個衍生了、承載着幾千年豐富的神學內涵的意義體，而不是一個

單純的「歷史－文學」產物，因此，神學解釋學有助於建構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深刻的《聖經》神學，它是《聖經》學能夠立身於漢語學術界、與其他多元宗教展開對話的起點。同時，它又不能流於自由的靈意解經，要自願地接受歷史評斷學的束縛，並從歷史評斷學的研究成果得到新的思想亮光。正如康德對先天綜合（a priori synthetic）知識所做的比喻一樣，鴿子在空中的飛翔，正依賴於空氣形成的阻力。這一研究路向，既需要歷史評斷學的扎實功底，又需要對基督教經學傳統的深刻理解和同情。要在這兩方面中的任何一個取得些微的進展，都需要樸實的作風。也只有這樣的樸實作風，才能避免走入「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宿命。

電郵地址：youbin99@sohu.com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Theology: An Interview with Paul Hanson on the Biblical Studies

YOU Bin
Ph.D., Peki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Paul Hanson, an Old Testament professor at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Taking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canonical criticism as the main issue,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area of biblical studies. For inst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final" form of the texts, canonical form and canonical process, archaeology, philology and theology, etc. Paul Hanson's proposal to understand biblical theology as a kind of "historical ontology" is elaborated.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methodologies in biblical studies are reviewed against the gener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rol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public discourse, the inspiration from Jewish and Catholic exegetical tradition for

the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 possible approach for th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are widely discussed as well.